

高教前沿

2019年第1期
(总第28期)

南京邮电大学高教所主办

2019年3月6日

目 录

高教资讯

-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1
- 2019年 打好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 4

专家论坛

- 高校人才队伍建设的“学者之思” 7
- 邬大光：“车辙”里的大学 13

调查研究

-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实证研究：类型与应用模式
- 以《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0-2017年195篇实证研究论文为例 19



高教资讯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分为五个部分：一、战略背景；二、总体思路；三、战略任务；四、实施路径；五、保障措施。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四个自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将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优先发展教育，大力推进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优化教育结构，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八大基本理念：更加注重以德为先，更加注重全面发展，更加注重面向人人，更加注重终身学习，更加注重因材施教，更加注重知行合一，更加注重融合发展，更加注重共建共享。明确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坚持优先发展、坚持服务人民、坚持改革创新、坚持依法治教、坚持统筹推进。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 2020 年，全面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增加，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再经过 15 年努力，到 2035 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2035 年主要发展目标是：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高等教育竞争力明显提升、残疾儿童少



年享有适合的教育、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聚焦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重点部署了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

一是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贯穿到教育改革发展全过程，落实到教育现代化各领域各环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教育战线，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中小学教育，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化、学理化、学科化研究阐释，健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成果传播机制。

二是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增强综合素质，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全面强化学校体育工作，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弘扬劳动精神，强化实践动手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完善教育质量标准的体系，制定覆盖全学段、体现世界先进水平、符合不同层次类型教育特点的教育质量标准，明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要求。完善学前教育保教质量标准。建立健全中小学各学科学业质量标准和体质健康标准。健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制定紧跟时代发展的多样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建立以师资配备、生均拨款、教学设施设备等资源要素为核心的标准体系和办学条件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强课程教材体系建设，科学规划大中小学课程，分类制定课程标准，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丰富并创新课程形式。健全国家教材制度，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增强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系统性，完善教材编写、修订、审查、选用、退出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推行启发式、探究式、参与式、合作式等教学方式以及走班制、选课制等教学组织模式，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大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重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构建教育质量评估监测机制，建立更加科学公正的考试评价制度，建立全过程、全方位人才培养质量反馈监控体系。

三是推动各级教育高水平高质量普及。以农村为重点提升学前教育普及水平，建立更为完善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办园体制和投入体制，大力发展公办园，加快发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提升义务教育巩固水平，健全控辍保学工作责任体系。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协调发展，鼓励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振兴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提升民族教育发展水平。

四是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提升义务教育均等化水平，建立学校标准化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优质均衡。推进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给。完善流动人口子女异地升学考试制度。实现困难群体帮扶精准化，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推进教育精准脱贫。办好特殊教育，推进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全覆盖，全面推进融合教育，促进医教结合。

五是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构建更加开放畅通的人才成长通道，完善招生入学、弹性



学习及继续教育制度，畅通转换渠道。建立全民终身学习的制度环境，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工作机制和专业化支持体系。建立健全国家学分银行制度和学习成果认证制度。强化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继续教育与社会培训服务功能，开展多类型多形式的职工继续教育。扩大社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快发展城乡社区老年教育，推动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

六是提升一流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分类建设一批世界一流高等学校，建立完善的高等学校分类发展政策体系，引导高等学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持续推动地方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结构与布局。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有机衔接、深度融合，集中力量建成一批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优化人才培养结构，综合运用招生计划、就业反馈、拨款、标准、评估等方式，引导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及时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加强创新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比重。加强高等学校创新体系建设，建设一批国际一流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全面提升高等学校原始创新能力。探索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链条、网络化、开放式协同创新联盟。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健全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体制。

七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素质的第一标准，推动师德建设长效化、制度化。加大教职工统筹配置和跨区域调整力度，切实解决教师结构性、阶段性、区域性短缺问题。完善教师资格体系和准入制度。健全教师职称、岗位和考核评价制度。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健全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优质中小学（幼儿园）为实践基地的开放、协同、联动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强化职前教师培养和职后教师发展的有机衔接。夯实教师专业发展体系，推动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自主发展。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完善教师待遇保障制度，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生活补助政策。加大教师表彰力度，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

八是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创新教育服务业态，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新型教育服务监管制度。推进教育治理方式变革，加快形成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与监测体系，推进管理精准化和决策科学化。

九是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推动我国同其他国家学历学位互认、标准互通、经验互鉴。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组织的合作。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优化出国留学服务。实施留学中国计划，建立并完善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全面提升来华留学质量。推进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建设，拓展人文交流领域，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特色发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海外国际学校。鼓励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在海外建设“鲁班工坊”。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研究制定。推进与国际组织及专业机构的教育交流合作。健全对外教育援助机制。



十是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教育法治化水平，构建完备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学校办学法律支持体系。健全教育法律实施和监管机制。提升政府管理服务水平，提升政府综合运用法律、标准、信息服务等现代治理手段的能力和水平。健全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提高教育督导的权威性和实效性。提高学校自主管理能力，完善学校治理结构，继续加强高等学校章程建设。鼓励民办学校按照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种组织属性开展现代学校制度改革创新。推动社会参与教育治理常态化，建立健全社会参与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监管机制。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了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实施路径：一是总体规划，分区推进。在国家教育现代化总体规划框架下，推动各地从实际出发，制定本地区教育现代化规划，形成一地一案、分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生动局面。二是细化目标，分步推进。科学设计和进一步细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划周期内的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教育现代化。三是精准施策，统筹推进。完善区域教育发展协作机制和教育对口支援机制，深入实施东西部协作，推动不同地区协同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四是改革先行，系统推进。充分发挥基层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大胆探索、积极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

为确保教育现代化目标任务的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了三个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二是完善教育现代化投入支撑体制。三是完善落实机制。

（新华社 2019 年 2 月 23 日）

2019 年 打好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

2018 年，开启了中国本科教育的新时代；2019 年，中国高等教育更要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在日前举行的全国高教处长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作了题为《演好“连续剧”念好“九字经” 打好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的主题报告，他表示，“2019 年要努力建设以质量文化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奋进文化，续写中国本科教育的“十新”面貌”。

打响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

吴岩指出，今年将以六个“一流”全面出击，建设一流本科、做强一流专业、推出一流课程、打造一流师资、实施一流质保、培养一流人才，打响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

“四新”全面引领高等教育未来

据介绍，新工科与新医科、新农科交织交融、交互发展，新文科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注入新元素，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为新文科提出新命题新方法。围绕“三新”理念，2019 年高



等教育将重点布局新医科建设，理念新——从治疗为主到生命健康全周期：预防、治疗、康养；背景新——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扑面而来；专业新——发展精准医学、转化医学、智能医学等新专业。

质量为王、标准先行，选树质量文化建设示范校

依托全国高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平台，今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将开展所有专业合格认证；对标专业建设质量国标，健全覆盖所有学科门类的认证机制；开展国际实质等效的专业认证。同时，也将选树一批质量文化建设示范校，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质量持续改进。

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慕课大会

据介绍，2019年，教育部将举办中国慕课大会，出台《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管理办法》，推进“亚欧会议慕课网络行动”，充分借助“互联网+教育”“智能+教育”，支持国内慕课平台横向联合，推动更多慕课上线国际著名平台。

全力打造双创教育“国际升级版”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拟更名为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大赛，此次大赛包含高教版块、职教版块、国际版块、萌芽版块四个板块。

两个“双万计划”对标一流本科教育

依据“新时代高教40条”，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将进一步深入实施高水平本科教育的总体目标，大力推进一流专业建设，一流课程建设，分别实施一流专业与一流课程建设的“双万计划”，打造新时代本科教育的“金专”与“金课”，全面夯实本科教育基础；实现各类高校全覆盖、各个专业类全覆盖，通过总体目标、面向各类高校、面向全部专业、突出示范领跑、分“赛道”遴选、两步走”实施、三年分批实施、专业申报条件八个方面，使一流专业建设成为高校全面改革的展示“窗口”；实施一流课程“双万计划”，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注重提升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

以基地建设为创新手段“孵化”基础学科拔尖培养

“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面向后天、布局长远，要建设一流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成为新时代拔尖人才培养孵化器，实现规模从“千人计划”到“万人计划”的巨变。”吴岩介绍，亿级资金将为加强“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提供保障。“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将以“拓围、增量、提质、创新”为重点，覆盖文、理、工、农、医、教各领域。

共同探索建设一流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

目前，普通本科院校1243所，新建本科院校702所，占56.48%。据悉，2019年，高等教育司将为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提供政策、组织、机制、服务、项目五大支持，全力建设神形兼备的



应用型大学。

中西部高校振兴升级迫在眉睫

中西部 24 个省市区高校数量及高校本专科生数量均占 60% 以上，中国高等教育三分天下有其二。吴岩表示，今年，要深入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升级版，已被列入国家 2019 年重点重大工作计划，研究制定“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升级版实施意见”，召开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升级版推进会。

筹谋国际人才引领推进公共外语教学改革

据了解，今年，高等教育将全面深化大学公共外语教学改革，在有条件的高水平大学推动开设第二、第三公共外语课程，并选择一批学校开展试点工作，为国家战略培养和储备“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人才。

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要回归“教研为本”

“高校教师不管名气有多大，荣誉有多高，老师是第一身份，教书是第一工作，上课是第一责任。”吴岩强调，要使新一届教指委充分动起来、干起来、忙起来、用起来，发挥好参谋部、咨询团、督导组、推动队作用，选树一批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典型，力推一批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工作先进单位，塑造具有大胸怀、大境界、大格局，且政治过硬、业务精湛、育人高超、技术娴熟的好老师形象。

用好中央高校教育教学专项改革

2019 年，几十亿资金的投入将聚焦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据介绍，根据《教育部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要求，高等教育将聚焦中央高校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和“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实施（金专金课），划定教育部教指委开展工作经费，并建议各省设立地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

加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深水区，甚至在一定领域进入无人区。”吴岩认为，理论指导型发展模式必须提到议事日程，必须着手加强高等教育战略思想、发展理念、重大政策、标准方法技术的系统研究。通过构建 1+3 的总体框架，做好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国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研究、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研究等专题，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理论对于改革实践的引领性、指导性作用。

（作者：吴岩 来源：人民网 - 教育频道）



专家论坛

高校人才队伍建设的“学者之思”

1月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召开,再次向世人展示了我国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高校作为科研创新的重要阵地,人才是其加快科研创新的第一资源,也是制约其科研创新的重要因素。围绕如何破解人才无序流动与人才评价“四唯”现象、国家人才战略如何进行规划与顶层设计等议题,当天,中国科学报社与同济大学联合举办第九届创新中国论坛·高校人才队伍建设论坛,邀请多位院士、学者展开讨论。

非均衡博弈期的三个动态均衡

杨卫(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浙江大学教授)

当前的中国,人才建设得到了科教界前所未有的重视,出现了人才流失情况大大缓解、青年科技人才成为科技进步的生力军、“青”字头人才计划不断涌现等积极进展。

而与之同时出现的则是种种科教人才政策的异化现象,表现为各种人才计划繁多重叠,在各高校与研究院所的人事改革中过度强调了核心岗位与人才称号的关联,高校“双一流”建设异化为争人才等。

从治本的角度来看,必须妥善梳理科教人才政策,认清造成现状的各种动因,注意挖掘隐藏在种种表象下的内在规律。

随着我国科教事业的动力型发展,以“非均衡”来打破“均衡”是前一阶段人才建设的主旋律。我国高校正处于一个人才队伍建设的非均衡博弈时期。然而,“非均衡”不可能成为一项长期适用的人才政策。

当前,普惠性的人才待遇政策在大多数高校不具备财政性资源的现实性,有时须仰仗在全国范围内近似公平的人才类计划的评审结果,来进行其择优支持的判断。

为了更好地把握高校的人才队伍建设,一定要做好三个特征分析:一是在时间尺度上,关注高校教师从业的长周期(约30年)与引进人才的脉冲型举措(约一届班子任期)的冲突分析;二是在师资断面上,关注普遍的师资质量提升与个别谱段的强化支持的绩效比较分析,这包括财政、学校声誉、师资心理、学生认同感等诸多方面;三是在学校的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如何满足各谱段人才的合理期望值的分析。

在这个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博弈期中,关键在于把握三个动态均衡。



一是人才队伍存量与增量的动态均衡，即“老人”与“新人”、“儿子”与“女婿”的平衡。“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可能在一段时间有效，但并不是长久之计。这一动态均衡有三个关键点：一是差异性待遇只能在加强竞争性风险的前提下获得；二是对“老人”和“新人”、竞争成功的人和竞争惜败的人，都应该有不失尊严的出路；三是在多种教师系列中，对同样学术水平的教师，在顶层一定要打通。

二是优势、热点学科与弱势、长线学科的平衡。学科的发展潮起潮落，其起伏周期远远小于学科的存在寿命。优势学科体现了学校发展的先期决心和投入，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而弱势学科也可能体现学校新的发展意图，需要经历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当然不能寄希望于发展过多的弱势学科，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三是各类资源的平衡。这包括广义人力资源和物化资源（硬件投入）的平衡，我国大多数高校这一比例为4:6，今后应逐渐过渡到6:4，体现学校建设从基础性的物质建设到软实力建设的过渡；现有资源与规划期望资源的平衡，我国大多数高校的心理承受值是5:5，今后可能逐渐过渡到更为现实的规划值7:3；稳定支持的人力资源与绩效挂钩的人力资源平衡，在师资队伍快速更替的时期，这一比例可达到3:7，而在师资队伍稳定发展的成熟期，该比例应该逐步上升到7:3。高校的薪酬不要与人才计划过度挂钩，既要注意到“二八”现象，也要顾及相同职称、年资研究者之间的基尼系数。

稳定核心队伍同时调动广大教师积极性

丁烈云（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

我想从人才与人事、人才评价、人才培养三个方面，阐述我对高校人才队伍建设的一点思考。

起初，高校只有人事管理，后来才有了人才管理。这里，既有国家的人才计划，也有高校的人才计划，其中，各种各样的人才计划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才的数量与科研产出服从“幂律分布”，即不低于某一科研产出的量的人数 y 与产出 x 之间的常数“幂”呈反比例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二八”法则。因此，人才队伍建设重要。但不能说戴了“帽子”的是人才，没有戴“帽子”的不是人才。

“人事”则与“人才”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不仅要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同时也要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毕竟人才再重要，高校的整体事业也不能只靠少数几个人去完成。所以，要加强其他队伍建设，包括管理队伍、作为专职研究人员的博士后队伍建设。

当下，人才评价是一个热点。我认为，评价时要遵循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两方面。

实际上，真正的人才都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厚家国情怀，都有为国家富强干一番事业的理想抱负。所以，一定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我一直认为，大学主要有三个要素，即学生、学者、学术。学生是立校之本，学者是立校之道，学术是立校之魂。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学术是狭义的学术，广义的学术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发现知识的学术,即科研;二是传授知识的学术,即教学;三是应用知识的学术,即科技成果转化。

为了遵循学术标准,既要写好发表在学术杂志上的论文,更要瞄准国家的重大需求写好发表在祖国大地上的“论文”;既要投身学科建设,也要投身专业建设,在专业建设中,一定要突出立德树人的中心地位,最优秀的人才一定要给本科生上课。

在具体的评价方法上,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当前定量太多、定性太少;要短与长相结合,不能只关注短期的评价,应该关注发展趋势的评价;要静与动结合,比如人才“帽子”要动态来看,不能一戴终生。

对于人才培养,要多引进国外的,少挖国内的,站在世界之巅选人才,而不是局限在国内挖人才;要多引进“富人”的,少挖“穷人”的,坚持正确的人才流动导向,坚持高层次人才向中西部、东北部流动,少挖中西部的人才,扭转人才无序竞争局面;要多谈事业,少谈金钱,一流的事业平台才是吸引一流人才的重要抓手,应该要搭建事业舞台来留住人才;要多练内功,少靠外援,一流高校应该成为一流人才的发源地,而不是靠挖别人的人才来发展;要多重业绩,少戴“帽子”,帽子固然重要,但更要加强多种人才统筹整合,构建科学规范的人才管理体系。

人才“群体效应”是学科发展根本

邓子新(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多年来,我一直在基层,在系、学院层面工作,也做了很多年院长。尤其是在上海交通大学,我经历了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甚至是由弱变强的全过程。因此,我想通过梳理上海交大生命学科的发展轨迹,来谈一谈高校人才队伍建设。

最初,上海交大的生命科学只是一个系,后来遵从钱学森的建议,在系的基础上建立学院,开启了“理工生”的交叉发展之路。

根据生命科学生物种类多,基础和应用涉及面广,学科交叉性强、发展快,传统学科与现代学科跨度大等特点,在建院初,我们就思考,在人才引进和培养时,如何兼顾传统学科与现代学科交叉。最终,确定了及早布局小学院、大学科,满足未来综合性人才培养,并建立与这种目标相适应的师资人才引进和培养的大方向。

起初,学院小,只要是人才就引进。汇聚的人才脚踏实地从头开始,把握好科研方向,构成了学院最初的自由式发展阶段。慢慢地,一些平台逐渐建立,加强了人才引进方向的布局,逐渐集聚了众多科研成果卓著、学术造诣深厚的著名学者群体。

学院经历了从自由式发展向布局式发展的“凝特聚优、由弱攀强”历程,诠释了人才的汇聚效应是学科建设的基石。

在用好人才的过程中,群体效应,尤其是群体聚变的效应能否发生,如何产生?这是学科发展的核心和根本问题。如今,学院集聚了一大批治学严谨、年轻杰出的学科带头人,并逐渐形成彼此关联的学术团队,在人才金字塔中的作用更坚固,更持久。他们中间有戴“帽子”的,也有很多没



戴“帽子”，但却发挥了核心作用的。他们共同推动着学院不断取得新成绩，攀登新高峰。

优势的群体精彩呈现，支撑并牵引着学科的全面发展。一个领军人物就像一个火种，能点燃熊熊烈火，能孵化出众多人才，并把一个群体做大做强。随着不同方向的领军人物向多元化发展，硕果也不断涌现，事实证明，人才的“群体效应”是学科发展的根本。

此外，我觉得，健康的“沃土文化”是“人才效应”的灵魂。

我们有深入人心的学院文化，其中，有规范个人的，也有规范集体的，还有规范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或校内与校外同事关系的整体的文化理念。其精神内涵，就是通过共荣文化引领健康的行为规范和共同的价值认同，来谋求整体的发展。

总而言之，学科要发展就要汇聚人才，并通过文化凝练和引领把人才用好，催化他们在一起产生聚变效应，才能在未来真正打造生命科学领域的全球影响力。

职业生涯规划是成才关键

康乐（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北大学校长）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40年，回忆当时改革开放的起步也是从人才上入手的——粉碎“四人帮”之后首先恢复的就是高考。我们国家经过了40年的发展，如今国家经济体量世界第二位、科技投入第二位、科技产出第二位、专利数第一位，培养的博士数世界第一位。

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于下一步人才工作的走向，我觉得应该深入思考。其中有四个问题非常关键：一是如何在创新中领跑；二是如何实现在重大科技问题上来自中国的突破；三是如何构建创新思维模式；四是如何保证可持续创新发展。而与之密切相关的，就是人才。

人才要具备专业技能，有一些是共同的。比如必须要有专业技能和丰富的想象力，要有分析和归纳的能力，要有组织能力、说服能力、交流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有时候，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重视的是人才的技能和专业知识，而对人才在组织能力、说服能力、交流能力等方面的训练还不够重视。

培养人才之所以成为大学最主要的职能，是由人才成长的规律所决定的，因为正规教育是快速成才的最好途径。

对于非常想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的年轻人来说，一定要在较宽的领域积累广泛的知识。另外，要选择一个分支科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对于不同阶段的学习，我觉得，要着重解决三个问题：大学阶段，要解决学有所爱的问题；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阶段，要解决学有所长的问题；工作阶段，要解决学以致用用的问题。解决了这三个问题，成才的速度才会加快。

人才只有放在正确的岗位上才称其为人才，而工作岗位就要有职业生涯规划，这也是成才的关键。一个学者，应该较早地确定自己的职业生涯，对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作出测定、分析、总结，并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和特点来确定自己究竟适合做什么。这当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比如必须清晰认识自己的优缺点，知道自己喜欢干什么，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知道环境允许自己干



什么等。

如今，“引进人才”成了很多高校的重要工作。但很多时候是引进了许多人才，却没能给他们创造发展才能的舞台。这样的情况就使得引进人才仅停留在了统计数字的“美观”上，成为了典型的“政绩工程”。

另外在人才引进中，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即应该“因神设庙”还是应该“因庙设神”。如果想把一所大学办得有特点、与其他高校有区别，就要依据学科优势和特点引进人才，这就是按需引进；如果一所大学因某个学科有特色、有优势，就应该集中引进这一学科的人才，使其形成团队效应，使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更加突出，这就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同质化和趋同性竞争。

此外，要对教师进行分类、定位，比如可以分成教学型、教学科研型、科研型、推广与成果转化型四大类。同时要根据这四种类型的特点来确定发展目标和评估机制。教学型就是传播知识，成为教学名师；教学科研型要出著名学者、教授；科研型要成为著名的科技专家；应用推广型要考核其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人才工作须成为高校的核心战略工程

侯保荣（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在当前“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高校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之间的竞争，要想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把人才工作作为学校的核心战略工程抓紧抓好。

要培养一流人才队伍，就必须打造人才高地，为人才成长成才搭建优质平台，这是高等教育构筑人才制度优势、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的战略之举。

首先，高校要注重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对接国家重大需求，优化学科布局，促进学科交叉，为人才发展提供优质的学术创新平台。

其次，高层次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体力量，加强国内、国外人才集聚和培育，是推动人才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根本举措。

高校要努力成为高端人才的“强磁场”，不断创新自身的引人用人机制，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延揽世界拔尖人才；坚持“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思路，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共享的思想吸引人才。同时，还要建立起高端人才服务体系，为他们提供周全的服务和优质的工作生活条件，让人才潜心于学术研究，从而发挥最大效益。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在这方面，高校需要通过实施并不断深化相关制度改革，持续释放和激发人才活力。这当中，“分类”尤为重要。

首先，要优化分类评聘。按照类别、岗位和学科等分别制定不同教师和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条件和评价标准，探索建立以代表性成果和实际贡献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方式；对从国内外引进的优秀人才，根据其本人实际水平、能力和业绩成果，可直接申报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职务；



对科研业绩突出、教学成果显著的青年教师，还应给予相应的鼓励措施。

其次，要优化分类管理和评价。国家层面要制定一些宏观指导政策，规范各种人才计划的评审。同时，要继续简政放权，把人才的培养、评价与各个单位的实际需要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高校层面要着重抓好分类管理和评价的落实。此外，还应优化分配体系，积极构建以岗位绩效工资为主体，年薪工资、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并存的多元薪酬分配体系；正确处理引进人才与本土人才的关系，坚持同等人才同等待遇。

师德建设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内涵式发展的必要支撑。

近年来，高校涌现出一大批师德高尚、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的优秀典型和先进事迹，但不可否认，仍然有少数高校教师理想信念模糊、言行失范，严重损害了高校教师的社会形象和职业声誉，消极影响不容小觑。

如何在重重压力和冲击面前守住“高尚师德”这个教师之魂、教育之魂，是对新时代师德建设工作的严峻考验。我认为，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顶层设计，高校要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教师要自觉加强师德建设。

总而言之，高校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不断汇聚高端人才，构筑人才高地，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高校人才分类应基于工作而非评价

萧鸣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评价具有指挥棒的作用，用得好，可以引领整个学科的发展；用得不好，则会起到破坏性作用。那么，高校在人才队伍建设当中该如何发挥好指挥棒的作用呢？如果引进了人才，却引而不管、引而不评，那就白引进了。

因此，要完善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

2018年初，中办、国办连续发布了两个关于人才评价的文件，第一个是要分类，第二个不仅是要对人分类，对机构、对项目也要分类。

第一个人才评价文件——《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其实有两大要求。

一是分类与评价的基础和目的。以科学分类与评价为基础，以激发与开发人才为目的。到底哪些人分到哪里？要以评价为基础，以工作分析为基础，以激发和开发人才为目的。如果我们的分类不利于人才发展、不利于人才激励，那是不行的。

二是分类方法。这份文件主要讲了横向与纵向两个指标。其中，横向指标又有组织外部与组织内部两方面，组织外部包括系统分类、区域分类，组织内部包括不同领域、不同工作属性、不同职务内容分类；纵向指标则分为层级分类、职级分类与职等分类。

当前，高校人才分类中主要有三大问题，分别是按照工作分类与按照人才专业素质分类的矛盾、按照人才专业背景分类与按照发展结果分类的矛盾，以及基础学科分类与交叉学科兴起、学科划分



模糊带来的人才分类困难。

而在人才评价方面，则主要是分类评价不足。多年来，我国一直是按照教育部评估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评价内容、评价方法评价所有的教师，包括纵向的国科与自科、科研经费总数、发表成果、教材、人才培养、学科教学与效果、社会服务与影响力等。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标准评天下，导致了各种问题的出现，比如评价指标阻碍重大原创研究、评价指标简单化影响人才成长等。

基于以上分析，我建议，基于工作分析分类而非人才评价分类，把高校专业队伍划分为科研、教学、转化应用与复合型四支队伍，各支队伍前 5% 要一视同仁；基于评价进行分类而非学科分类，对所有学科领域中的拔尖人才一视同仁；基于领域与原创性进行分类；基于项目、机构进行人才评价，投入产出综合衡量；基于合同内容分期中后进行绩效管理与考评，非每年进行评价。

（作者：王之康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9 年 1 月 10 日）

邬大光：“车辙”里的大学

题记：马车，是上个世纪 60-70 年代乡村的主要交通工具；土路，是当时乡村交通状况的真实写照；车辙，是马车留在泥土路上的碾压痕迹，儿时去农村玩耍和“插队”当“知青”时，车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把车辙与大学联系起来，纯属个人遐想。其实，就是在用一个自然现象的“概念”，论述一个“老问题”，试图捅捅我国高等教育的“窗户纸”。构思这篇《车辙里的大学》，使我熬过了最没有年味的厦门春节，但愿大学和自己都能够从无形的“车辙”中走出来。谨以此文献给 2019 年我的春节。

不久前，与一位学医的同事品茶聊天，她的一句“今日的大学像在车辙里行走”。慢慢品来，她说的蛮有些道理，从医生的角度，似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大学的“病因”。“车辙”，在我的记忆里不但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当下大学之困，不正是一个“车辙”隐喻吗？

一、儿时的“车辙”记忆

车辙，是马车在路面上行驶后，留下的车轮压痕。尤其是农村的泥土路，在马车轱辘的不断碾压下，车辙越来越深，马车则习惯地在深深的车辙里前行。

我小学中学时候的寒暑假，都要去农村的外公家玩上几天。因为舅舅是车把式，我最喜欢的事就是跟着舅舅“出车”，整天坐在舅舅的马车上。起初，舅舅为了安全起见，总是叫我坐在“后车



沿”。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位置开始前移，特别爱坐前车沿。按照东北话的说法，双腿“一片”就可以跳上去，见此情景，舅舅也就不干涉了。坐在“前车沿”的感觉很爽，有点儿像汽车的副驾驶。

深深的车辙，似乎只有在乡村的土路上。每当舅舅的马车上了乡村土路，也就自然走进了车辙，此时，舅舅也会默许我操几下鞭子，装模作样地“吆喝”几声，体验一下“车老板”的范儿。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此时的马车不是我赶着走的，而是老马的“习惯”动作，过去的记忆，使得“老马识途”。

中学毕业后，我去农村“插队”当了“知青”。一年半之后，被调到公社猪场当保管员。任务很简单，就是每天带着猪场的车把式老邢和他的马车，去市里的酒厂和酱油厂，拉回酒糟和酱油渣喂猪。常年如此，几乎风雨不误。马车压出来的车辙有10-30厘米，深深的车辙就像车轨，指引着“老马”和我俩，即使老邢打个小盹儿，我们也会安全顺利地到家。青少年时代与马车结缘的两段经历，车辙的印象清晰地深嵌在我的记忆里。

车辙的形成，其深度有浅有深，既有土壤的差异，也有车轱辘的区别；既有“马车”“负荷”的影响，也有季节的影响。马车的辙，既是方向，也是路标，给人一种无形的安全感。我也曾注意到，当前方没有车辙了，只要车把式“吆喝”着马继续前行，马儿还是要走，马车就不会停下来。儿时的秋收季节，舅舅赶着马车到山上拉秸秆，经常碰到没有辙的小路，几次翻车，可还是要把秸秆拉回家。

把大学与车辙联系起来，这似乎只能是一个从“农村人”成长为“大学人”的人，在跨时代、跨阶层、跨文化的“特殊”人生经历经验中建立起来的联想。然而这种联想，并非无端的臆想。

二、大学的“辙”之理

把大学与车辙联系起来，一定被认为是一个联想的“奇葩”！其实不然，大学就像是一个车，暂且先不说它是独轮车、两轮车或三轮车，甚至多轮车。早期的大学是“轧辙之车”，后期的大学，特别是文化变迁中模仿其他文化中的大学，就是“覆辙之车”。尤其是在文化变迁中，那些模仿外来文化和大学的大学，更是面临着内外部两种文化“撕裂”或“张力”中的两条路上的“辙”，即：一条是外来文化中的大学的“前车之辙”（也可称之为“楷模之辙”），另一条是本土传统文化中曾经有过的传统或旧式的“大学之辙”。

马车的“辙”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大学的“辙”则是一种“人为现象”；马车的“辙”是一种“有形现象”，而大学的“辙”则是一种“无形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张“无形的网”，罩住了许多大学。

先有车，后有辙，这是常识。大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车？大学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辙”？是一个很难下结论的话题。在我看来，任何社会组织必须回应社会需求才会产生并存在。因为只有这样，社会才会供养它，除非他是一个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大学也不例外。早期的大学，基本上是上层社会传播知识、培养君子或绅士或僧侣知识分子的机构；而中世纪的西欧城邦大学，则是市民社会需求的产物。民族国家出现后，政府介入大学的力量开始彰显，而教会、贵族阶层、社会民众也不断提出自己的需求，他们都成为再塑“大学之车”的有生力量。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大学有时是独



轮车、有时是双轮车、有时是三轮车。每一种力量，似乎都想为“大学之车”装上一个“奔向自己的方向、驮负自己物品的轮子”。

“前车轧辙”与“后车覆辙”，是自然规律。后面的车之所以“必须”覆辙，因为“存在就是合理的”。前车之辙，是历史地因果联系的结果；然而，“后车覆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了。因为，覆辙，符合经验和思维惯性，给马和车乃至坐车人一种安全感，超越之心则降到了最低。可是，后面的车“覆辙”则往往带有些许困惑，既想突破已有的前辙，又担心“离辙翻车”或迷路。中国传统文化曾对“前车之辙”有过深刻的论述，如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就是对“覆辙”的深刻反思。前面的车子翻了，后面的车子就要引为教训。《荀子·成相》中说：“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汉·刘向《说苑·善说》则说：“前车覆，后车戒。”再如，流传千古的政论文《治安策》中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后车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当我们把大学比喻为车，在后车的冥冥之中，又会时常感觉到时代的变化，需要有新生力量介入大学，重塑或再造大学，腐朽的力量应该退出大学。而新生的力量一旦壮大，新兴的观念一旦清晰，并得到大众化传播和认可，大学与外部的需求就会形成新的结合，出现新的面貌，形成新的“大学之辙”。反之亦然。腐朽的观念和力量以及对大学的重塑或影响，一旦在大众面前暴露了落后，就一定会被大学赶出校门。

纵观世界大学的发展轨迹，一个国家“大学之辙”的形成过程，既是寻找“大学之辙”的过程，也是留下“大学之辙”的过程。从“辙”的层面看，世界上主要有四种大学之辙：其一是英国为代表“大学之辙”，其二是以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大学之辙”，其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学之辙”，其四是以前苏联为代表“大学之辙”。四条“大学之辙”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辙”。而在这四条辙上前行的大学，唯一的区别就是：“大学之辙”的深度不同，“后车”的数量不同而已。

首先，从“辙”的深度上看，英国的大学开辟的“博雅/绅士教育”之辙，德国的大学开辟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之辙，美国的大学开辟的“社会服务”之辙……都属于深深的“大学之辙”。其次，还可以从“辙”的宽度上看，以人才培养为例，英国大学之辙是以“导师制”和“住宿学院制”为基础，注重绅士教育；美国大学之辙是以“学分制”和“核心课程制”为标志，突出通才教育；前苏联大学之辙则以“学年制”和“学科专业”为特色，凸显专才教育。几条“大学之辙”基本打开了人才培养和通向知识殿堂的大门。各国大学在沿着这些“大学之辙”前行的过程中，又碾压出了或深或浅的“辙印”。

需要承认，历史悠久的大学，自然就有了“趟辙”的先机。而“后发国家”的大学，沿着“前车之辙”前行，也就成了不二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历史上那些先行的大学，给后来者留下了无数的“大学之辙”。显然，在大学的千年前行中，其生命力和竞争力，就是看你给后来者留下了多少“辙”？一个好的大学，既要“趟辙”，又要“留辙”。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五次转移，就是“改弦易辙”的过程。例如：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后，为了与内地高等教育学制对接，用了近15年的时间，改变了英国高等教育的传统模式，从本科三年制改为四年制。



再如当下的新加坡高等教育，在沿着英国的“大学之辙”走了40年之后，也正在思考如何跳出英国之辙。

三、“辙”的路径依赖

对“辙”的依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不由得使人突然想起“航天飞机的宽度是由马屁股决定的”这一典故。

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4.85英尺，可许多人并不知道，为什么要采用这个标准？原来，早期的铁路是由造电车的人设计的，而4.85英尺正是电车所用标准。而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沿用了马车的轮距标准。

那么马车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轮距标准呢？原来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从古罗马人那里来的。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其军队所铺设，而4.85英尺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而罗马战车的轮距，则是根据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而这一宽度竟然用在航天领域了。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助推器，因为这些助推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路上又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铁轨宽一点。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是由铁轨的宽度决定的。所以，最后的结论是：“路径依赖”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而这个宽度竟然是两千年前由两匹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的。

该故事告诉我们：一旦人们做了某种判断，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这种现象就被称为“路径依赖”。

北大朱苏力教授对此种现象曾有过深刻的剖析：在考察一个制度时，人们习惯于从善良愿望出发考察它的纯洁、崇高的起源。而一个制度的失败，也往往归结于其先天的理论不足或创制者的道德缺陷……在这里，起源似乎并不重要，制度实际发生的作用和意义并不因起源的神圣而增加，也不因起源的卑贱而减少。制度在发生学上的伟大意义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构建起来的，在后来者的总体历史观的观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才带上了神圣的光环；而这种光环常常使得我们不能或不敢以一种经验性的求知态度来“凝视”（福柯语）它和凝视我们自己。”——朱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对大学而言，影响“大学之辙”的因素十分复杂。尤其对后来的大学而言，什么时候沿着什么样的辙走？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这里的“辙”指的是“路径依赖”，其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千校一面”、“同质化”、“墨守成规”等等。如果大学都沿着一条“辙”前行，那么特色、引领、创新就成了一句空话。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的“大学之辙”，已经从理论和制度层面延伸到我国大学实践的多个层面。如：布鲁贝克关于高等教育的政治论与认识论就是一种“理论之辙”，牛津剑桥的书院是一种被神化了的“书院之辙”，前苏联的专业教育更是一种被推向极端的“人才培养之辙”。在我国高等教育的语境下，虽然人们很少谈及“辙”，但“辙”的思维随处可见。例如模式，作为一个概念，在我国高等教育界的流行，其实就是“辙”的思维惯性。诸如人才培养模式、办学模式、



管理模式、投资模式等概念的泛化，就是对“辙”渴望，对车辙的依赖，对制度的依赖。

四、我国大学的“辙之困”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已经出现了“辙之困”，“弯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辙之困”的反省，“接轨”和“改辙”正在成为走出“辙之困”的新主张新思路。其实，我们面临的唯一任务就是走出“中国大学之辙”。趟出一条“辙”，就是走出一条路。作为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就是要制定将中国高等教育引领到中国的土壤上来；作为书记/校长，就是要把学校领到正确的辙上来；作为老师，就是要把学生领到做人与学术的“辙”上来。大学，只有走出自己的“辙”，且有“后车”跟随，就是引领。而实现这一目标，只有扎根中国大地，我国的大学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辙。

与英美国家、欧洲大陆国家和前苏联相比，国外的大学已经碾压出了许多“大学之辙”。但细细数来，属于国人碾压出的“大学之辙”相对偏少。近代以来，我国先学习欧美大学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全面学习前苏联，且一直延续至今；改革开放后，随着苏联解体，我们又转向了学习美国，颇有“重蹈覆辙”的意味。殊不知，我们“舶来”的是西方的“大学之辙”，却没有“舶来”西方大学开路的本领，更没有“舶来”西方大学开路的意识。南辕有点儿北辙，恐怕就是西方大学在我国的一种历史和现实写照。尤其是我国的许多大学，只知道沿着前苏联的“大学之辙”前行，使其“前辙”的痕迹越来越深，以至于难以自拔。

其实，我国曾有自己碾压出来的“大学之辙”，例如中国古代书院，就是具有示范意义的中国“大学之辙”。可惜的是，由于古代书院在我国出现了“断头路”，也就断了中国大学的“历史之辙”。尔后，“接轨”也就成了我国近代大学以来的唯一道路选择。以至于到了今天，如何“接轨”还是一个热门话题。

关于“接轨”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即寻找适合我国大学“辙”的问题，我曾访谈过两位西方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美国学者阿尔特巴赫就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有“辙”，而且只有一条辙，中国的大学只能沿着这条“辙”前行；而加拿大学者露丝·海霍则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没有“辙”，现在的世界一流大学之辙绝不是大学发展的“终极之辙”，中国应该走出自己的“大学之辙”。

今日的大学管理者，有点儿像我儿时赶车的样子，装模作样地挥着鞭子，自以为是自己在赶着大学这驾马车前行，其实，是马的“经验”使然。明明是走在别人的“辙”里，却不承认自己在“辙”里，更不愿意承认是在别人的辙里。古人云“老马识途”，表面上看，讲的是“识路”，其实是“识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辙”也好，“轨”也罢，关键是你赶的马车或者开的汽车是否适应已有的“辙”和“轨”？辙有辙“理”，轨有轨“道”。一个的大学“辙与道”，只能基于自己国家的土壤，才能走出自己的“辙”。

结语：走出中国的“大学之辙”

摸着石头过河，只能是在水浅的河里。我国高等教育走到今天，已经走过了水浅的河，等待我们的是无数的高等教育“深水区”，前方再无“石头”可摸，无“辙”引路。如何趟过“深水区”，



已经历史地摆在我们面前。鲁迅在《故乡》里曾写到：“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果鲁迅先生活在当代，不知该如何让吾国大学走出“辙之困”？而西班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的诗句也许对我国的大学走出“辙之困”更有启示意义：路人啊，本没有路，海面的波浪便是道路。

其实，“辙”也是办法，更是谋略。东北人遇到困难，经常用“辙”来表达。例如：你到底有没有辙？没辙了吧？赶快想辙？没辙拉倒！大学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集中表现。一个民族要超越，大学首先要走出“覆辙”的困境。

(来源：江苏高等教育网)



调查研究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实证研究：类型与应用模式

——以《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0-2017年195篇实证研究论文为例

实证研究倡导“用数据资料说话”。实证研究的论文由于其学术质量较高，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借鉴，推动学科领域的深入发展，为各级教育咨询与决策提供可信依据，因而备受研究者、管理者和决策者的重视。华东师范大学于2017年1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加强教育实证研究，促进研究范式转型”的行动宣言，再次凸显出新时代教育实证研究的重要价值。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发表的媒介、平台和阵地，历来重视有价值的实证研究成果。期刊编辑作为学术成果审阅的除作者之外的第一人、学术成果最终发表的重要“守门人”之一，也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如果从编辑的视角来审视教育实证研究论文，能否梳理出实证研究论文的类型和特征？这是否有助于教育实证研究在写作和分析上的规范？笔者将从期刊编辑的角度，来审视教育实证研究的类型和特征，以期为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一、概念界定与样本选取

1. 概念界定 / 操作框架

虽然学术界对实证研究的讨论较多，但都没有给出达成一致的实证研究的概念。涂元玲（2007）曾归纳出人们对教育实证研究的几种错误认识：“教育实证研究是一种研究方法”“教育实证研究等同于关于教育的经验研究或实验研究”“通过访谈、观察、问卷调查、民族志研究等开展的教育研究或质的教育研究是教育实证研究”“教育实证研究不需要运用文献资料和思辨或理论研究”等。从某一方面看，这几种认识都符合教育实证研究的表象特征，但却经不起考验和检验，因为方法并不是检验是否实证的唯一标准，量化（quantitative）和质化（qualitative）方法是任何研究都可以采用的。还有学者对实证研究进行了哲学思辨式的讨论。例如，袁振国（2017）认为实证研究是精神、规则和方法的有机结合，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程建坤（2016）在反思教育研究实证情怀的基础上，指出教育研究要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走出唯“实证研究”是从的窠臼，秉承诠释与实证相结合，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有鉴于此，在秉承实证研究自身内涵的同时，笔者结合以往学者对实证研究的认识，从期刊编辑审稿和可操作的视角出发，提出一项实证研究应该满足如下四个特征（刘选，2017）：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实证的研究方法、合理的数据分析过程、经得起考验的诠释。换言之，从操作框架来看，一项实证研究是由“真实问题 - 方法运用 - 数据分



析-结论诠释”构成的统一体。如此，判定一项教育研究是否为实证研究就有了可依之据。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总体上运用基于经验论的归纳和演绎的思想和方法。研究流程包括：借鉴已有研究制定判断实证研究论文的可操作概念框架，依据该框架对论文样本进行甄别和统计，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归纳远程教育实证研究论文的类型，结合论文样本归纳远程教育实证研究论文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实证研究进行应用案例分析。在对实证研究论文样本进行甄别和统计过程中，主要借助 EXCEL 和 SPSS 两种工具进行数据的录入、统计和分析。为确保研究的信度，由其中两位研究者按照“真实问题-方法运用-数据分析-结论诠释”的框架分别对每一篇文章进行分析，对于有争议的文章，与第三位研究者进行协商，最终做出综合裁断。对每一类实证研究论文的特征主要针对其方法论意涵、研究流程和分析模式进行归纳和分析。

3. 样本选取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作为教育技术和远程教育领域一本重要的学术刊物，学术质量和期刊影响力近些年不断提升。自 2010 年刊物更换封面、首次进入 CSSCI 至今，《现代远程教育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办刊风格和特色，CNKI 发布的期刊影响因子也逐年上升，2017 年的影响因子更是达到 5.205。《现代远程教育研究》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我国教育技术和远程教育的发展，因而其刊发的文章相对这一学科来说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以《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0-2017 年的全部文章为样本，依据上述实证研究的判定依据来筛选实证研究的有效样本文献，最终有 195 篇文章符合本文界定的实证研究概念的要求。

二、远程教育实证研究论文的主要类型

国内华南师范大学焦建利教授最早将美国佐治亚大学 (University of Georgia) 托马斯·C. 李维斯 (Thomas C. Reeves) 对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分类框架引入 (焦建利, 2003)。该分类框架分别从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两个独立的维度进行划分 (Reeves, 1995)，最具有教育技术学的研究特色。从谷歌学术的引用情况来看，截至 2018 年 5 月 25 日该文已被引用 154 次，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分类框架在学界受到较高认可。虽然李维斯的分类框架是从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两个独立的维度进行划分，但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应该联系起来讨论，只有立足于研究问题和目标，才能选择适合的方法，离开目标来谈方法也有违研究系统性的宗旨。这里选择该分类主要基于两点：一是该分类有利于指导研究者较好把握已有的教育技术研究的主题和目标，便于快速聚焦某一研究目标；二是该分类揭示出研究方法相对研究目标应置于从属地位，即某一研究目标可以选择多种研究方法。这种分类思想与本研究所界定的实证研究的操作框架具有某种一致性和契合性。

上述分类主要立足于从实证研究论文中所涉及的研究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的角度来进行的分类，同时兼顾教育技术研究的特色，力图做到使得每种分类重点明确，分析模式清晰，与其他研究类型交叉较少。有如下四个问题需要说明：

一是实证研究论者认为实证研究是关于第一手资料的研究，因而针对某一主题的文献研究不是



实证研究 (Wallen et al., 2001), 但笔者认为这仅是强调资料收集的手段。随着各种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和文献分析工具功能的不断增强, 借助各种电子数据库开展的系统性文献研究也符合实证研究的特征, 因而也符合本文所界定的实证研究的判断依据。

二是文本本质上也是一种文献。笔者将两者分开主要有两点考虑: 其一是两者的来源和用于研究的目的具有明显差异: 文献研究主要针对存储于专业数据库中的学术文献, 主要包括期刊文章、硕博学位论文、报纸、会议论文等, 用于归纳、提炼和可视化呈现某一主题的研究概况; 而文本主要是指一些发布于网络及平台中的政策文件、访谈文本、论坛讨论数据、个人访问网络的轨迹数据等非学术文献, 用于了解现状或佐证某些研究结论。其二是两者的研究范式不同: 文献研究主要体现为一种量化研究范式, 而文本研究主要体现为一种量化或质化研究范式。

三是关系研究表面上属于实验研究的范畴, 因为通常情况下实验研究的分析方法就是通过控制变量法来检验一个或多个变量的变化对不同群体所产生的效应。但是, 从实证研究论文的内容来看, 实验研究和关系研究也有明显的差异: 实验研究有明确的研究目标, 非常强调前期实验设计, 实验过程中对课堂现场的控制、观察和记录, 实验后的数据分析, 而且通常是小样本的。而关系研究则非常强调对调查回收数据的分析过程, 既可以是不同变量之间复杂的关系分析, 还可以是要素或因素之间的关系分析, 而且通常样本数量较大。

四是从宽泛的意义来理解, 任何研究都离不开调查, 文献调查、案例调查、文本调查、实验调查, 但这仅是强调数据资料获取的方式。若将调查研究作为一类实证研究, 则它与其他类型的实证研究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总体而言, 调查研究具有明确的调查目的, 一般以现状研究为主, 通过调查问卷和(或)访谈获取一定范围的资料, 随后对回收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并对统计结果进行合理的解释和分析, 同时提出对应的对策建议。

三、远程教育实证研究论文的典型特征

1. 文献研究的特征

文献研究通常依据“确定主题→设计框架→搜集数据→统计数据→分析数据→未来展望”的流程, 其中设计框架通常运用内容分析法或归纳演绎法, 数据搜集通常借助国内外各种学术文献数据库(如中国知网、万方、维普、Spring、WOS等), 数据统计主要借助EXCEL、SPSS、SAS等工具软件, 数据分析项目通常包括文献数量随年代变化情况、主要作者群体、发文机构、出版期刊, 以及通过题目、关键词、摘要、论文结构等信息归纳该类文献的研究重点和发展脉络。分析过程中通常会通过可视化的图和表来呈现, 随着Citespace等可视化分析软件的应用普及, 呈现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和精确化。总体而言, 文献研究类论文体现出“描述→归纳→展望”的分析模式, 以描述和归纳为主, 展望的内容相对较少也较弱。描述基本都按照年代、作者、发文机构、出版期刊、基金项目、题目、摘要、关键词等进行统计和呈现。归纳是在描述的基础上先整体把握某一类研究在某一时间段内的发展变化, 然后将其置于社会背景下进行整体讨论, 挖掘推动研究发展的动力和关键事件, 然后再在文献世界中反复比较、不断回溯, 直至将该类研究的脉络、重点、难点、多样性都较好地归纳和



展示出来。展望是在归纳基础上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行性的建议，只有归纳到位，展望才能既有针对性，又有借鉴性和特色。

2. 建构研究的特征

建构研究遵循从猜想到设计再到验证、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逻辑演进路径，可进一步细分为数学建模、量表编制、模式与模型建构三类。

数学建模主要是通过纯数学公式来分析因变量随自变量变化的情况。数据通常来自国家层面的统计数据、各省市的年报年鉴数据、各级学校的基础数据、各科研院所的数据库数据，以及各种报告中发布的开放数据等，数据样本量较大，分析过程都紧紧围绕数学模型进行，力图揭示深藏于现象背后的规律。

量表编制主要是根据研究的需要，在相关理论指导下自编量表，或者在已有相关量表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其研究思路通常是“确定量表框架维度→维度细化→项目编制→信效度检验→量表应用”，前两个环节非常重视参考借鉴的依据，以增强其信度；项目编制环节主要是依据量表编制要求进行准确的语言表述，以免产生歧义；信效度是决定量表能否推广应用的关键和依据，通常包括两轮检验，即对初试量表的小范围检验和成型量表的较大范围检验，只有达到一定的信效度，才能认为是一份合理的量表。

模式与模型建构研究主要是指在一定教学理论或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何克抗等，2009）。结构框架重在从宏观上把握教学活动整体及各要素之间的内部关系和功能，活动程序则突出了教学模式的有序性和可操作性。该类研究的思路通常是“依据某一理论或技术提出一种新的模式雏形→确定该模式涉及的主要要素→确立理论或技术支持下的要素之间的活动关系→应用或检验模式”。

3. 案例研究的特征

案例研究不仅适用于对一些既有现象的形成和运行情况进行解释和分析，而且也适合于对现象进行纵深描述（罗伯特·K·殷，2010）。案例研究的大致流程是“根据研究目的选取案例→对案例进行纵深描述→证明由案例支撑的结论”。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案例可以有两种类型：案例本身和以案例为依托。案例在研究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对其进行纵深描述的程度也不同，若以案例本身为研究对象，则对其描述程度最高，也最具有典型性，该类研究通常以单个案例为主，主要运用“描述→分析”的分析模式。以案例为依托的案例通常是项目或机构中的多个案例，既可以是同质案例，也可以是异质案例，通常因研究目的的需要对其某一或某些方面进行描述和比较，该类案例研究一般通过量化比较或质化分析，以达到对研究目的的解释和支撑，该类论文通常运用“建构/设计→描述/比较→解释/支撑”的分析模式。

4. 实验研究的特征

实验研究是一种受控制的研究，通过一个或多个变量的变化来评估它对一个或多个变量产生的效应。实验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的做法是研究者预先提出一种因果关系假设，然后通过实验操作来检验该假设是否成立（袁荃，2015）。在实证研究论文中，实验研究



遵循“提出假设→实验控制→结果检验”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模式。该类研究主要体现出两种类型：一是针对传统课堂教学开展的实验，二是借助现代脑科学和心理学的工具和手段来开展的精细化实验，两类研究都体现了实验研究的思想，尤其是后者更体现出实验研究在教育技术中的应用潜力。

5. 调查研究特征

调查研究是指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有计划、有目的地获取数据，并对所获数据进行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加工，以期获得对某一问题客观、深度的认识。调查研究中调查的途径和手段可以有多种，但主要以问卷和访谈为主。调查研究的流程通常是“根据研究目的设定调查问题→编制调查问卷→实施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提出改进对策和建议”。调查问卷编制不同于专业的量表编制，其严谨性要求相对较低，只为特定的研究目的服务，但在问卷主体部分最好也能体现出一些相关理论和已有研究的支撑。调查实施主要考虑调查的对象是否具有全面性和典型性。数据处理一般选用基本的统计分析方法，并以图表形式呈现。对策和建议主要是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6. 文本研究特征

文本研究不同于文献研究的典型特征是，文本资料主要来自访谈文本、论坛文本和政策文本等非学术文献。其中基于政策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量化分析的模式，即依据“搜集文件→整理文件→统计分析→结论与借鉴”的流程进行分析。而基于访谈和论坛的文本研究则主要采用质化分析的模式，即通过对访谈或论坛文本进行多级编码，结合相关理论进行不断阐释，直到获得研究者认为可行的概念范畴和结论。随着在线学习和混合学习的日益普及，以及各种文本挖掘工具和可视化工具的发展成熟，基于文本的研究也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实证研究类型。

7. 关系研究特征

关系研究的典型特征是强调对调查数据的过程分析，聚焦于不同变量或要素之间关系或结构的分析，样本量较大。关系研究相较于调查研究，更加强调过程的复杂分析和呈现；相较于实验研究，不仅样本量较大，而且研究范围并不局限于实验课堂和学生，可以是任何条件和对象。实证研究论文中，关系研究主要体现为不同变量间的关系分析、要素或因素间的关系分析两种类型。其中，不同变量间的关系分析主要使用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呈现出“描述→归纳”或“描述→改进”的分析模式；要素或因素间的关系分析主要使用探索性分析、验证性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呈现出“描述→探索”或“探索→验证”的分析模式。

（作者：刘选，田党瑞，汪燕 来源：《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8年第四期）

